

## 现场企业招聘岗位一览表



▲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一日千里，對就業市場難免有一定的衝擊。

技術進步對於就業的影響，從工業革命開始就是社會的焦點和研究的關注點。但無論是從原因研究結果，還是從本質看到表象，人工智能（AI）就業衝擊這一次來得真的不同以往。面對可能的AI就業衝擊，需要澄清一些認識，確立若干政策原則。

# 如何化解AI就業衝擊？



人口經濟 蔡昉  
中國社科院  
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AI就業衝擊不再是歷史上反覆出現的「技術性失業」幽靈，而是可以替代幾乎所有職業的終結者。從懂科學的企業家馬斯克，到關心AI發展的經濟學家薩默斯，都認為AI對崗位的替代將是全面的，一旦不久後通用人工智能（AGI）出現，簡單的、複雜的、體力的、智力的，無論何種崗位將無一幸免。

AI技術進步的速度之快，愈來愈讓人有一日千里、一日三秋的感覺。例如，從1770年「土耳其下棋機器人」的騙局到圖靈1950年論文發表，經過了180年；再到1997年「深藍」戰勝卡斯帕羅夫，又經歷47年；再到「阿爾法狗」於2017年戰勝柯潔，也相隔了約20年。但從ChatGPT問世到Sora的出爐，僅僅相隔一年。

大模型AI的「發展悖論」注定了崗位的大規模損失幾乎是必然的。陣營之間、國家之間、企業之間都認識到，能否佔據AI技術和產業的制高點關乎生死存亡。

這導致圍繞着AI的發展，形成一種類似冷戰時期太空競賽、軍備競賽、核武器競賽的競爭。而挖掘模型用途、擴大用戶群、提高回報率的必然方向和方式，便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減少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使用。

然而，只要人類勞動沒有徹底由人工智能替代或者決定，就仍有一些東西不會發生變化。這些沒變的事物或方面越發彌足珍貴，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時間窗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仍然是主導的一方，仍然是「人告訴機器做什麼」。這一點既有技術上的含義，也有制度上的含義。也就是說，人類應對崗位替代的兩條根本出路，迄今尚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雖然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校正方向。

## 強化勞動者社會福利

第一，人力資本依然是抵禦AI衝擊的底氣，但是人類需要把揚長避短作為AI時代人力資本培養的基本策略。至目前為止，人類智能仍然具有優勢的方面在於：1）軟技能而非硬技能；2）科學知識以外的能力，而非認知能力；3）情商而非智商；4）人文的理解力和同理心，而非數理化的解題能力，甚至不是編碼技能；5）隱性的知識而不僅是顯示性的技能。

第二，社會福利體系仍是根本性的託底制度，而且履行此類功能的物質條件日益增強。北歐在建立福利國家之初，在制度設計中就突出「去商品化」，即弱化勞動力作為私人要

素的屬性，強化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社會權利。在AI的「崗位破壞」日益大於和快於「崗位創造」的條件下，這個理念和做法愈來愈重要。

## 就業替代五種出路

在AI發展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前提下，社會對就業替代做出反應的方式，不外以下幾種。

首先，轉到要求更高技能的崗位。這是樂觀的經濟學家始終堅信的結果，自從歷史上發生「盧德主義」運動以來，也不斷被事實所證明，只不過這要求勞動者具有更高的技能與之相適應。包括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已經從以前對技術進步創造崗位充滿信心，轉變為如今認為「盧德主義」自有其道理。

其次，轉到勞動生產率較低，從而報酬也較低的行業。庫茲涅茨把勞動力向更高生產率部門轉移，是產業結構變化的正常方向，與之相應，生產率降低的崗位則屬於具有「逆庫茲涅茨化」特徵的崗位。從客觀上說，新崗位的正規化程度要低於原來的工作。從主觀上說，新崗位的體面程度也要低於原來的工作。總而言之，就業質量被降低。

其三，轉到少量具有高需求彈性行業的崗位上。這是指那些人們保持着巨大的需求，卻天然具有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特性的行業。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把表演藝術作為這種行業的典型例子。這種類型的行業和崗位能否繼續存在，以及能否得以擴大的關鍵，在於人們對相應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及其彈性，但此類行業的規模和崗位數量並不會無限擴大。

其四，轉到由新的消費所誘致出來的崗位上。人類今天的消費項目，在若干年之前可能是難以想像，在更早的時候索性就不存在。就業崗位也是如此。未來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們的品位在變化，新事物新觀念不斷湧現，因而消費的領域不斷拓展，職業類型花樣翻新。鑒於這類崗位的消費歸根結底由供給側生產率的提高引起，是一種「供給創造需求」的現象。

其五，轉到因重新定義而出現的崗位上。以前不符合就業定義的活動，如今在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支撐之下，可以被社會承認為「就業」，並以轉移支付的方式得到補償。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人自認為是「作家」，卻沒有作品出版並獲得酬勞，按照失業的調查定義，這種「在過去一周內未從事一小時以上有報酬工作」的狀態，則不被算作就業。但如果社會負擔得起，也完全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就業。

與此類似的情形，還包括那些不再尋求就業的人群，這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當事人有供養來源，例如索性採取啃老等方式「躺倒」；另一

種是無需就業，卻可以得到普惠性的社會福利支撐。例如，如果實施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制度，就形成一種環境，使受到就業衝擊的一些人選擇不再參與傳統意義上的工作。

根據經濟學上人類應對技術替代就業現象的長期經驗，可以提煉出幾個原則性建議，即通過制度建設、政策調整、體制改革引導技術發展以及市場主體行為，最大限度做到幾個「同步」：1）保持崗位破壞速度與崗位創造速度的同步性，特別是在數量上儘可能使轉崗成為可行的；2）保持各行業生產率提高速度的同步性；3）保持AI替代勞動力的速度與培訓勞動者能力的速度同步性，儘可能縮短再就業摩擦期；4）保持生產率提高與生產率分享的同步性，這也是公平與效率統一的要求和體現。

從政府職能的角度保障落實以上原則，還可以從若干既重要且緊迫的應對之策入手。

## 加強非認知能力培養

加快建設中國式福利國家。對此應該強調幾點：1）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或者說以摩爾定律的速度加快完善社會福利體系；2）按照普惠的原則設計和完善福利制度，這意味着改變以往嚴格識別社會福利受益對象的理念，因為在崗位的加速流失時代，已經愈來愈無法區分一個人是否「躺倒」，而且人工智能驅逐勞動者本身具有強烈的外部性；3）用社會共濟、社會保護和權益保障，抵銷非正規就業的蔓延趨勢及其對勞動者的不利影響。

大幅度延長義務教育或免費教育年限。與AI競爭的需要，一方面對人力資本提出愈來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更偏重非認知能力的培養。哈佛大學兒童發展中心的研究顯示，在人生的最初幾年，大腦每秒鐘能夠建立超過100萬個神經元連接，這在此後任何生命階段都無法重現。非認知能力的最佳培養時間在三歲至四歲，最理想的舉措是把義務教育延長到這個學前教育年齡。勞動生產率的預期大幅度提高，可以顯著擴大教育公共資源，足以支撐更長的兒童在校時間。

消除在兒童發展、教育與培訓、流動與就業、社會保障，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礙。其中特別是消除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存在的制度原因。

研究表明，對於孩子的人力資本培養，特別是對於非認知能力的獲得，以及他們終生的社會流動機會，父母的養育和照護具有學校和社會均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解決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面臨的此類問題，應該置於最高的優先排序。

# 人行貨幣政策轉向價格型調控



大學之道 薛清和  
智本社社長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上月在第十五屆陸家嘴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也是新行長首次系統地闡述當前的貨幣政策立場。在筆者看來，人行未來將重點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減少資金空轉套利，盤活存量資金，緩解資源配置扭曲，追求金融高質量發展，以支持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也就意味著，短期大規模減息的可能性不大。

貨幣政策立場的調整，其背後是貨幣政策框架的變革。人行當前的貨幣政策框架是數量型調控與價格型調控並重，但持續向價格型調控演進。

所謂數量型調控，指的是貨幣政策以貨幣數量（通常以M2為指標）為中介目標，央行通過增加或減少貨幣數量來實現最終目標（控制通脹和充分就業）。數量型調控的理論主要是費雪、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數量論。1970至1992年，美聯儲採用數量型調控工具。

所謂價格型調控，指的是貨幣政策以短期利率（通常以隔夜拆借利率為指標）為中介目標，央行通過調節短期利率來影響不同市場、不同品種、不同期限的利率，進而實現最終目標。數量型調控的理論主要是泰勒規則。

1993年，美聯儲宣布採納泰勒規則，標誌其貨幣政策從數量型調控轉向價格型調控。如今，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歐洲等發達經濟體央行均以價格型調控為主。價格型被認為是現代貨幣政策，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調整是大勢所趨，包含以下三點轉變：

首先，從理念上，數量型調控更加注重貨幣數量的量化指標，而價格型調控更加注重效率指標。從「規模情節」到效率提升，淡化對數量目標的關注，這一貨幣政策立場的變化，與貨幣政策框架的演進方向是一致的。

其次，從中介目標上，數量型調控是貨幣數量（常以M2為指標），而價格型調控是短期利率（通常以隔夜拆借利率為指標）。這是二者的重要差異。

當前，人行貨幣政策中樞是MLF（中期借貸便利）利率，人行通過控制中長期利率，進而影響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最終調節市場利率。貨幣政策的利率走廊比較寬泛，上廊是常備借貸便利（SLF）利率，下廊是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

未來，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取代目前的MLF利率。人行可通過控制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通過利率走廊調控市場利率。新的貨幣工具可以有效地釋放中長期利率，提升利率調節作用，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利率走廊的寬度預計也將收窄。

再次，從基礎貨幣投放市場上，從當前的銀行貸款市場轉向債券市場。債

券市場將成為未來新的主要基礎貨幣投放市場。

潘功勝指出，逐步將二級市場國債買賣納入貨幣政策工具箱。很多人將此理解為量化寬鬆。潘功勝對此澄清：「把國債買賣納入貨幣政策工具箱不代表要搞量化寬鬆，而是將其定位於基礎貨幣投放渠道和流動性管理工具，既有買也有賣，與其他工具綜合搭配，共同營造適宜的流動性環境。」

在二級市場上買賣國債，是價格型調控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方式。2014年以來，人行的基礎貨幣主要通過MLF向銀行貸款市場投放。如今，銀行貸款增速放緩，基礎貨幣投放效率下降。隨着貨幣政策轉向價格型工具，人行需要擴大買賣國債的規模，並將買賣國債作為常規的基礎貨幣投放工具。

## 預期管理需要加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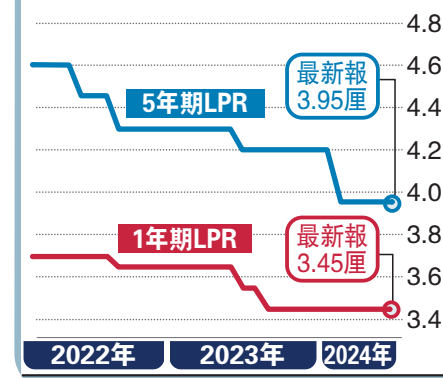
與美聯儲式量化寬鬆政策，人行未來購債的特點可能是：常規性、長期性、不定量、買賣雙向、各種期限的國債都有可能買賣。人行購債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其一，為政府化債、融資提供支持；其二，增設和擴大新的基礎貨幣投放市場，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其三，完善收益率曲線，為建立價格型為主的現代貨幣政策創造條件。

向價格型調控轉型是現代貨幣政策的主流趨勢，但該價格型調控需要具備一些非常重要的條件，如價格敏感的金融市場、完善的收益率曲線，以及人行貨幣決策的透明度和有效的預期管理。

另外，價格型調控要求人行具備較強的預期管理能力。潘功勝說：「現代貨幣政策框架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央行能把政策考慮和未來展望，及時與市場和公眾進行比較透明、清晰的溝通。」

需要注意的是，從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轉型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衝突。今年以來，人行購債預期和商業銀行購債推動國債利率持續快速下降，進而推動整個市場利率下降，導致現行的貨幣政策中樞MLF作用減弱。這被稱為剪刀效應。美聯儲和日本央行在貨幣政策調整期間均遇到類似衝突。近期，人行決定借入國債和啟動正回購工具，以打壓國債價格，提振國債收益率。在轉型過程中，人行需要在買賣國債與MLF之間把握平衡。

## 人行1年期及5年期LPR（厘）



# 租金續升 增加買樓誘因



主樓布陣 布少明  
美聯物業  
住宅部行政總裁

踏入7月份，新盤勢浪接浪，料為下半年新盤銷情開一個好勢頭。但鑒於一手貨尾量依然高企，截至6月底止仍超過2.19萬伙，故發展商面對出賃壓力，唯有以「求量價」推盤促銷。

根據美聯物業研究中心資料，截至今年第二季，新盤已連續八季出現「負溢價」，即新盤開價低於同區二手價，尤其上一季更出現12%的負溢價，創歷來季度最大紀錄。面對一手的低價，難免會對二手樓價帶來壓力。

「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33.31點，按周跌約0.23%，連跌三星期；本年迄今樓價跌幅擴大至近3.1%，再穿年內低位，並創逾七年半新低。

筆者對樓市前景樂觀，原因已在早前專欄詳談，在此不贅。但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除了中央對本港經濟與樓市眾多政策層面的「扶持」，以及本港金融市場有望復甦外，其實當下本港樓市亦有不少值得憧憬的利好因素。

最近樓價由高位整固，變相代表買家置業入場費降低。「美聯樓價指數」與十年前（2014年7月）的116.98點相比，升幅已收窄至約14%。據政府統計處資料，居於私人物業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今年2月至4月錄得約4.09

萬元，比十年前（2014年2月至4月）約3.18萬元，上升近29%，跑贏樓價走勢，意味置業入市能力相對提高。

另一邊廂，在特區政府致力搶人才及內地學子湧港下，租金水平節節上升。據美聯物業研究中心資料，租金已連升六季，並創自2018年第三季後最長紀錄，令「租金升、樓價跌」的背馳情況進一步擴大。

租金強勢同時樓價回調，對樓市帶來兩點啟示。首先，對於手持足夠現金的租樓人士而言，租金持續回升，不排除即將出現「租貴過供」的現象。而樓價持續整固令入市更具吸引力，相信部分租客很快按捺不住「轉租為買」，從而增加對物業的需求，始終長遠而言「供平過租」，提早入市較為划算。

## 投資回報吸引力上升

此外，租金水平穩升，若以投資者及用家角度看，租金回報會變得相對穩定，無論投資或自住將更具吸引力，亦可達到抗通脹之效，惠及未來二手樓價及交投。

總括來說，樓市在全撤辣至今的數個月「觀望期」，不少準買家「心大心細」遲遲未入市，其間已累積一定購買力。只要未來租金升勢延續，又或者香港步入減息周期，令租金回報率多於存款利率，同時「供平過租」的情況慢慢增加，屆時勢吸引一批正在租樓的人士，以及觀望中的買家加快上車置業，為樓市帶來新一波購買力。